

关于中国本位文化

问题的讨论

主编 / 龚书铎 / 李文海

宋小庆 / 梁丽萍 /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 历史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讨论/宋小庆等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丛书)

ISBN 7-80647-744-6

I. 关... II. 宋... III. 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143 号

书系分卷名: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

分卷主编:龚书铎 李文海

书 名: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讨论

作 者:宋小庆 梁丽萍

书 系 总
责任编辑:李晃生

责任编辑:洪安南

书籍设计:梅家强、王玲云、朱 燕、李仲熙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3.375 **印数:**1-5000

字 数:35.7 万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平) 30.00 元(精)

ISBN 7-80647-744-6/I·466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79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邓光东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的公元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最为复杂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最为急速深刻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结束了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像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百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远涉重洋、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慷慨赴死,涌现出一个个思想巨擘、学术巨人、英雄豪杰、民族骄子,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活剧。一百年,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却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现象,既

是历史奇观,也是历史奇迹,是中国历史的壮举,为世界历史所罕见!它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坚强决心、非凡勇气、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伟大民族、优秀民族!

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发生遽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打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经济基础的变革需要思想解放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因而纵观古今,放眼中外,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为先导,以百花齐放、学术繁荣为前奏。如果说,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适应并推动了社会变革,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则解放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那么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正是在各种思潮相互冲突、相互交锋、相互激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背景下发生急遽而深刻变化的。这个世纪的学术繁荣,是继春秋诸子学说之后的一个学术思想巅峰,其问题之复杂与纷繁、规模之巨大与宏伟、内容之丰富与新颖,又非春秋战国所能比拟,而其对社会进步影响之深远,则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

如今,二十世纪渐渐远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当忘记的。这个世纪,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世纪,是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世纪,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世纪,也是最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清理和评估、反思和总结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从来没有中止过学习与实践、思考与奋斗、探索与拼搏;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有太多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痛、经验与教训。仅就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术领域而言,就造就了许多重要学术人物,涌现出许多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流派,进行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辩,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所有这些,像奔腾不息的江水,像璀璨明亮的群星,像振聋发聩的春雷,像熠熠闪光的瑰宝,汇成巨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所有

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门槛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回顾与反思、梳理与廓清。

哲学社会科学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学术,归根到底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晶。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时代的巅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性思维。中华学术,从来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问题,历来就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相联系。它既是一个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个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所谓纯学术问题当然存在,但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与政治挂钩,特别不主张学术问题政治化。但有些学术问题确与政治密切相关,尤其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相关。只要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二十世纪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一次次学术论辩或学术争鸣,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在上述几个领域的学术论辩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详尽地占有材料,做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由表及里的工作。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对经济、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历次论辩或争鸣,反思其是与非、成与败、功与过、得与失,寻找其发生的历史、社会缘由,探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彰扬前贤、昭告后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所幸的是,黄楠森、邢贲思、方克立、龚书铎、李文海、费振刚、

韩兆琦、郭志刚,田本相、倪震、梁茂春、邓福星诸同志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欣然分别担纲《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史学卷、文学卷、艺术卷主编,为本书系的学术品位和书稿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从1999年底开始就积极策划编辑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经过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已将该书系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书系的作者和主编们为撰写书系,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翻阅了无数重要文献,耗费了许多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术界的不少专家,纷纷关注和支持该书系的出版。所有这些,令人感奋,令人欣慰。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书系的作者们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论述方法及酣畅流利的文笔,努力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述评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介绍观点全面准确,叙述过程简明扼要,评论评价公正公允。全书基本理清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百年学术论辩主要问题的脉络;对所列论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析;以历史和全局的目光,对一百年来各种重要论辩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使人们对历次论辩产生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该书系是作者个人的科研成果,虽经主编们认真审校,仍属作者自己的作品,见仁见智,亦属自然。

值此书系陆续付梓之际,受各分卷主编的委托,写下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2004年11月

主编前言

龚书铎 李文海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史学也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有过两次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再从近代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20 世纪初,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 年)、《新史学》(1902 年),剖析了旧史学的“四弊”、“二病”,主张以进化论为指导,突破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学的狭隘格局,使历史学能够“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梁启超从理论上和体系上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成为“史界革命”的开端。而第一部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著作,是 1904 年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此后,随着研究者历史观的进步,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吸纳,以及殷墟甲骨、敦煌文书、秦汉竹简、明清档案等新史料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新的风貌。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利用“二重证据法”,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互结合、印证,证实了殷王室的世系。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大胆打破传统学说,追寻历史真实。七册《古史辨》收有学界讨论古史传说、先秦诸子、汉代经文等文章 300 余篇,对于廓清古史迷雾多有贡献。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方法,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主张史学研究应该“竭泽而渔”的陈垣不仅对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讳学、史源学、文献

学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唯物史观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将中国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1924年,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出版。其后,以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开拓前进。他们积极参与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自觉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实践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们立足中国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在20世纪,人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史学理论和学术问题,并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例如:古史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后来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经过讨论达成了共识,有的则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这种讨论对于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繁荣了史学。

回顾中国百年史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学研究及学术论辩中的得失短长、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很有必要的。这里,不可缺少的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贬低、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的声音。有人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战时史学”,仅仅是战时政治的附属品,缺乏学术价值;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公式、原理,是“教条主义史学”、“阶级斗争史学”,所研究、讨论的问题如“五朵金花”,都是“伪问题”,所进行

的也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这类说法不是事实,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第一,所谓“五朵金花”涉及的古史分期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都客观地存在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之中,对于其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当时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参与了讨论。可以说,它们是一些思考中国出路的人们所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从整体上认识、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所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既深化了中国史研究、普及了唯物史观,又培养了大批的史学人才,推动了史学的发展。比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为日后明清经济史研究以及清史研究的深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一向致力于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这方面,郭沫若堪称典范。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与扎实的史料考订工夫相结合,将《诗》《书》《易》等典籍的资料,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考古资料熔于一炉,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分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做了深刻剖析。其他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也是如此。正因为他们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照搬教条、原理,所以,也才产生了对中国古史分期的不同见解。在当时那样一个遭到打压、封杀而且缺少“话语权利”的处境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却依然能够得到发展、壮大,代表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说,还是缘于其自身的内在力量——一种任何依附于政治的理论、学说所无法具备、难以比拟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自觉、自愿地学习和接受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由此就断言政治主导了学术(史学),不再有真正的学术讨论,还是有失公允。1953年,筹办

《历史研究》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鉴于史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仍存在着不同意见,需要讨论,所以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当时,人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甚至“小人物”挑战“大权威”,也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1959年,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仅一年时间内各种报刊就发表文章百余篇。参加讨论的除了专家学者,还有普通的中学教师、学生。只要翻阅一下三联书店出版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讨论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和《续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等文集,我们就不难看到那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当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和应用也有一个逐步熟练、深化的过程。其间难免回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同时,学术不应该从属于政治,但学术毕竟难以完全避开政治的影响。当我们国家和党的政治生活中“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正常的、健康的学术论争也就受到了严重干扰,结果是既妨碍了学术,也损害了政治。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不应当回避,而需要加以认真地研究、总结。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似乎所有的学术论辩都是“左”的错误的产物,没有任何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这种对学术史采取的简单化、情绪化的态度,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客观真相,所以是无益而且有害的。

在百年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一套书中全部包括。所以,我们只是择其重要者,如五四前后关于历史学问题的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争、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以及革命与改良问题、文明的起源与民族问题、中国历史人物研究问题、新时期以来

的文化讨论、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 11 个问题,著为 11 卷。

本套书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当时讨论各方的不同意见,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时人的观点,在一些地方对于原文做了较为完整的摘引。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套丛书,虽然做了统一的要求,但由于各卷情况不尽一致,所以,仍然存在着不甚统一之处。

由于能力、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2004 年 8 月

目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讨论的缘起与过程	009
一、“一十宣言”的策划与发表	009
二、文化问题论战的发生与展开	031
第二章 国民党政府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061
一、国民党政府 30 年代的文化政策	061
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成立	075
三、国民党官方的文化建设理论与中国本位的文 化建设	083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本位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上)	122
一、众说纷纭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122
二、本位文化建设与专制独裁	144
三、中国文化的改造和更新	166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本位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下)	190
一、“文化上的民族主义”	190
	001

二、科学化：“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惟一目标”	229
三、建设“大众的文化”	257
第五章 关于全盘西化的讨论	273
一、西化何以“全盘”	273
二、怎样认识文化的惰性	289
三、文化的优劣与抉择	306
四、全盘西化与中国近代国情	313
第六章 欧化与国粹之间	324
一、西化派对西化、传统的不同认知	324
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建立	348
三、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	366
结 语 在历史的坐标上	386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96
跋	407
后 记	409
编辑后记	410

绪论

1935年1月10日,北平、上海、南京的十位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埴幹、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通称“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由此引发了一场为时一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在当时影响颇大,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报刊发表了文章或社评,对宣言予以支持和响应。一些文化名人、学者也围绕宣言或阐发、补充,或批评、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如时人所言:“宣言发表之后,影响国内文化界甚大。现在已经成了各地留心文化、研究学术者所讨论的题目。”^[1]

1935年6月,马芳若将各界讨论文章搜集整理,汇集成书。原定的书名是《中国文化论战》,后因何炳松认为“论战”一词已用得太滥,编者遂按照何的建议改为《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由上海龙文书店出版,不久便又再版。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收有各类文章157篇,另有附录3篇。所收文章到1935年6月底为止。

同年8月,主编《文化建设》月刊的樊仲云将该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编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据樊仲云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宣言发表后,“颇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讨论的文字,单就《文化建设》月刊所能转录者,已达百万字以上,可见世界人士对这

个论题的注意了。”该书“去议论重复或相雷同之作，而择其自有主张系统井然者”，共 50 篇，凡 30 万言。1980 年，叶青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又将其影印出版，更名为《中国本位文化讨论集》。

此外，由麦发颖编辑的《全盘西化言论三集》（1936 年 10 月出版）一书，收集了 12 篇站在“西化”立场批评“本位文化运动”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还有：钟离蒙、杨风麟主编《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 2 集 第 6 册）中国文化问题论战》。

这场文化讨论所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一定影响。首先，它本身所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有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中西文化的特质、全盘西化论的检讨、文化发展的规律、西化与现代化、民族化与世界化、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等等。如果我们再把这场讨论放到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那么就可以进而发现，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化流派、有代表性的文化主张，或是萌生于这场讨论，或是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阐发并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场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的文化讨论，才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在此后近七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在探讨中国文化问题的时候，历史上的这次讨论仍不免时常被人提起，虽然对它的评价依旧是见仁见智，甚至是针锋相对。

例如，此前，全盘西化派的影响主要是限于南方特别是广东一地，而正是通过积极参与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战，陈序经及其文化主张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当时，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文章中就这样写道：“全盘西化的问题从前有吴稚晖胡适之诸位先生的鼓吹，近来又似乎添了一员新将陈序经先生。”^[2]而学术界的领袖人物胡适，也是在论战中才首次明确了对全盘西化派的支持。全盘西化派的主要观点，如中国文化百事不如人、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惰性说，等等，在本位文化论战中均得到比较充分的阐发和宣传。与此相对应，本位文化派所提出的对全盘西化的批评思路也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似乎仍未被根本超越。有

趣的是,80年代,人们在讥讽全盘西化派时,有一句话常常被人使用,即“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而早在30年代的本位文化论战时,有人便已这样嘲讽所谓食洋不化者:“什么都觉得外国的好,甚至偶尔‘举首望明月’,也不免想到外国的月亮似乎总还是比中国的清朗。”^[3]

又比如,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说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实际上在30年代的本位文化论战中,就已经有人明确提出并阐发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4]此外,在当今学术界得到很多人支持、肯定的文化“综合创造说”,其代表人物张岱年先生当年就参加了本位文化论战,是在与全盘西化派的辩驳中提出并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

这场文化讨论所反映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从本位文化运动的发起来看,它确实得到了国民党当局(主要是陈立夫所代表的CC派)的大力支持,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一十宣言”和“我们的总答复”,在本质上,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原则问题上,与官方的主张多有契合之处;被时人指为“曾致力于党务”的十教授,与当局也是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从社会效果来看,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助长了国民党当局引发的尊孔复古逆流,这恐怕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十宣言”一经发表就得到各方热烈响应,就有那么多的学者积极参与,其中缘由绝非一句“当局指使”便能说清。况且单就十教授而言,他们各自的文化主张也不尽一致(特别是与其联名发表的“宣言”相比),他们同当局的关系、对本位建设的理解以及对尊孔复古的态度,也还存在着差异。此后,他们各自的人生选择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有的为抗战奔走呼号,甚至为国殉难;有的则落水(或一度落水)成为汉奸;有的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有的则拒绝国民党的拉拢而留下来迎接解放。至于那些参加讨论的学者,其学术背景、政治立场、文化主张也是千差万别。再就论战本身而言,大致可分为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两大阵营。但仔细考察又可发现,西化派中实际又分为部分西化派和全盘西化派;而本位文化派的一些人也并非如全盘西化派所指责的那样,

是所谓主张复古、拒绝西化。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你来我往的论战显得非常热闹;另一方面,则是参与者观点上的异中有同、同中见异,使论战的阵线有时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而且,有人是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辩,有的则主要是正面阐述对文化建设的意见。即如《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一书的编者马芳若当时所言:“这虽是‘全盘西化’论者和‘本位文化’论者两派的论战,编者认为还未到短兵相接的地步;只是各派在说明自己的主张罢了。同时这样分成两派也是很唐突的,因为主张西化和主张中国本位的同派里,也有矛盾、冲突的地方。”他承认,这是“一场混战”。也无怪乎何炳松会建议以《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作为书名,来代替马芳若拟定的《中国文化论战》。^[5]对于这一切,都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自80年代“文化热”在祖国大陆兴起后,对这场文化讨论的研究开始多起来。从观点上看,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是基本否定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这里面又存在着几种不同情况。戴知贤在其《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一书中,以一节的篇幅,着重分析了本位文化建设的性质和作用,指出:“所谓‘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在本质上同‘戴季陶主义’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并无区别,它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国难深重时刻掀起的‘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它的确在文化界起了转移斗争目标的恶劣作用。”对于全盘西化派与本位文化派所进行的论战,戴知贤一方面认为,胡适对“十教授宣言”复古本质的揭露是相当深刻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胡适是站在“全盘西化”的立场上来抨击十教授的复古倾向,是“从一个错误极端去否定另一个错误极端。因此它虽然尖锐,却不可能战而胜之。”^[6]冯友兰则指出:“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这是这个‘宣言’实际上所要说的话,其余都是些空话。”^[7]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另有论者是肯定全盘西化思潮在当时“是